

## 新鲜而犀利的现实透视

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看了腰封上那些远远近近、大大小小、反差极大、色彩迥异地撞击眼球的关键词,又浏览了几章摘要文字,感觉这可能是一部以北京生活为背景的现在很流行的描写权钱情色、爱恨恩仇的都市连续剧式的小说。但是当我一章接一章读下去之后,却被渐渐展开的既熟悉又陌生的社会景观、人生世相所吸引。说熟悉,是因为小说里描写的那个十八里香外来人口聚居区里的人和事,都是我们经常遇到,有时还不免打些交道的;说陌生,是因为对这些人的各种行动、交谈所交织起来的他们生活的真相、精神的焦虑、内心的悸动,我们还太少深入的了解。作者逼真真实地写出,遂使读者觉得新鲜。

读其文,不免揣想其为人。我曾猜想写出这泼辣、生动、真切文字的作者,可能是熟悉北京城乡结合部底层生活的年轻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作者已经是写出过许多作品的机关干部,《漂二代》是他在深入生活两三年后辛勤创作而成的新作。可见,由文章去推断作家,有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漂二代》所写的“假伤门”事件,是小而敏感的、很容易引发被诬受害群众及其同情者愤怒情绪的偶发事件。随着这一事件的酝酿、触发、展开,作者按迹追踪,追根溯源,切近而广泛地写出了十八里香外来新居民的生存状况、生活方式,刻画出众多性格鲜明、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物。小说虽然主要着力于宋肖新、肖祥、张杰、韩可可、李京生、“小东北”等“漂二代”中各种各样的青少年形象的绘状,但连带地也描写了他们的上一代,即父兄辈的许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如李跃进、韩士改、赵家仁、肖桂柱、张刚、冯萍萍等,完整地勾勒出几个漂移到北京来定居已逾20多年的农民工家庭的浮沉聚散的命运和变幻不定的轮廓,从而画出了一幅极具时代特色和地域特征的移民图。同时,小说也描绘了作为“假伤门”肇因的另一方,与十八里香居民形成对蹠的不法房地产商汪光军、贪腐干部冯援朝及其家人等诸多人物形象,还有被“假伤门”事件牵动的民警小乔、居委会主任韩冬、律师冯功铭、被包养的情妇李豫生、小饭馆老板娘“少半勺儿”等形形色色的社会角色。如同被连根带泥地拔出的草和树一样,这些被“假伤门”事件牵拉出来的漂移、出入于十八里香社区的人物,有根有梢、须尾毕现,共同交织成一幅色相纷呈、声态竞异的人生百态长卷。正是这些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芸芸众生,以他们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顽强欲望和意志,创造出新北京生气勃勃、日新月异,五光十色又有点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恩格斯语)参与这一过程的总是一个个具体的活人的行动,而驱使他们行动的,则是各个不同的、常常是互相冲突的意志;而其中的每一种欲望和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生成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恩格斯语)而由此就产生、造就像自然过程一样进行着的现实生活的流程、姿态和声色。《漂二代》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和价值就在这里:它创造了在我们文学画廊中还较少见到的北京新居民的生活图景。这是世情的精微的具象呈现,是民意、民魂的飞动的透彻观照。小说所具有的饱满的人生画面、鲜浓的人世色相、浓郁的生活气息、焦虑不安的社会情绪、惊心动魄的肉肉冲突等等,远远溢出了作者主观上为解释、评价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所演绎、设定的那些主题意向。形象大于思想。这是优秀小说的艺术分析中常常会遇到的现象。在《漂二代》中,这种现象是特别突出地存在着的。

从外部特征来看,《漂二代》无疑是一部对现实生活的深层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并试图从中提出并解决某些急迫的社会问题的小说。小说提出的一个很触目的问题是“漂二代”的北京户口问题,但这个问题在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条件下,暂时还只能是一个无解的社会难题。而且,从小说艺术描写的生活实际来看,它也很难作为一个获得生活发展逻辑支持的主题去进行开掘。在小说丰满连贯的生活画面和错综连的人物关系上,的确含有可供多方面抉发的丰富意蕴。你可以说它是反映北京奥运会前夕社会维稳问题的小说,也可以说它是描写都市一角特殊的青少年群体成长问题的小说,还可以说它是以伸张社会正义、守护人的尊严为主旨的法制题材的小说。其实,说它是什么小说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确是小说,不是认识和解答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的宣示材料。作者虽是机关干部,但他是有生活的,他认真深入了生活,吸纳并消化了许多都市郊区新居民中的生活素材,生活印象,了解了很多“漂二代”青少年的行为和心理,写出了一部生活性很强、生活味很浓,而且触及到一些人生小微,让人为之心动的小小说。

那么,从小说艺术描写的实际来看,作者六神所注、七情所系的東西是什么呢?

我认为,从作者笔下的“漂二代”中的大多数人物的生活条件和精神状态来看,对于宋肖新、肖祥、肖祥、李京生,甚至包括张杰、李豫生一类人物而言,“漂二代”遇到的,已经不是他们的父兄一辈刚进城时亟需解决的生存问题、温饱问题,而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来的,或者是生活在城市里自然而然产生的人的发展问题。这个较他们的父兄一辈更高也更人性化的发展问题,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较高、较精致的现代都市文明、体面的物质生活的享有;二是对提高人的复杂劳动技能、文化创造才能、人格自我塑造潜能至关重要的教育权的平等拥有;三是对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信心和向往,以及建构在此基础上的人的尊严感和公民感的守护。这三个方面,其实也是中国现阶段绝大多数的民众们仍然需要争取的,更何况生活在十八里香的这些敏感而不平的青少年呢?

## 题材领域的新突破

胡平

《漂二代》我看过以后的头一个印象,就是觉得非常冷静,从作者思考的内容到叙述都非常冷静,确实站在一个相当的高度来处理这个题材。小说的事件很小:一个“漂二代”和一个开发商儿子发生冲突,在社区民警的调解下已经和解了,但是那个开发商不干了,制造了一个“假伤门”事件,由此牵涉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一连串故事。

这个事件特别小,但是就是这个小事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事件。我很欣赏这个“小”。我觉得这个书写的立意还是很深远的,而且它还不只是打工文学。打工文学一般是讲农民到了城市以后,还处在底层的境遇,这本书还深入一层,原来这本小说名叫《北京户口》,不是《漂二代》这个名字,但从内容来讲前者可能更准确。这里面我注意到户口这个词确实是关键词,在书里出现了多次,实际上这本书就是围绕着户口。

到了今天,农民题材不断进展,也确实反映了时代不断进展。我们的文学开始是写乡村农民,再后写城市的农民,现在写“漂二代”。小说在这一点上非常敏感,非常深入抓住了我们目前一个非常复杂的、严重的,也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问题。我们过去的办法基本上是把农民钉在土地上,现在呢,是一个农民巨大解放的时期,不管你是哪里的,你是河南的、湖北的,都可以来北京,而且都可以在北京买房、居住、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农民梦想的实现。

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时代,少平、少安的梦想就是到煤矿当个煤矿工人,他们感觉那是命运的改变,那么高兴,更何况一个人从河南跑到北京来能够生存和工作,也是农民非常巨大的解放,是他们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巨大的优惠、巨大的实惠。但是,农民来到城市,参与城市建设,能不能合法地成为城市的公民,与城市公民人格上的差别能不能消除,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写的户口问题,是打工文学题材的更进一步的深入。他提出了更进一步城市化农民题材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题材新的进展。

这本小说的思考不仅如此,它更思考了户口给人权上带来的鸿沟,通过这个事件展示了城乡新的对立,而且不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就是在城市内部也有不同群体的对立,读者感觉到开到了思路,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

曾镇南

由于生活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就生活在“都市里的村庄”里,十八里香的“漂二代”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对于贫富分化加剧导致的生活落差感的承受力,他们的生活经验和进行生活斗争的本领,是远高于

人们的预料与估量的。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人们实际上的不平等和差距,并不能一触即发地引起他们心灵的不安与悸动。但是为什么像“假伤门”这样小而敏感的司法案件,却能一下子激发十八里香的大部分居民的愤怒与抗议,首当其冲地把“漂二代”们不同程度地卷了进去?为了逼现汪光军一手炮制的假伤诬陷案的真相,为了唤醒迫于压力一时作了伪证的人们,为了揭穿汪光军试图以阳谋来获得安全撤职、全身而退的伎俩,为了被冤枉拘留的肖祥获得国家行政诉讼请求赔偿,为了防止言行极端、报复心重的张杰走上犯罪的道路;一句话,为了司法的公正、社会的正义得到维护和伸张,也为了自己发展的安全感和尊严感得到保障和守护,宋肖新、宋京生、张刚、冯功铭这些年轻人进行了怎样紧张、谨慎和坚韧的努力!看来,司法公正、社会正义的确是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石,是维系和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后的底线,也是守护全体国民的安全,提高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尊严感的关键。《漂二代》所描绘的这一段围绕着“假伤门”而展开的生活的波澜,是有所奔赴的,也是自有归趋的。当我掩卷回想整部小说的作意、结构、人物、境界这些大的关目时,我才感到,作者不仅能对生活作新鲜而犀利的现实透视,而且有驾驭生活的比较成熟而深沉的社会价值观,有严肃而谨慎的法制观念和政策观念,更有高尚而纯洁的道德感和伦理热情。在小说驳杂而混乱的、灰色的甚至有点阴郁的生活底色上,灼然闪动的,是作家淑世护生的良心与美意。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老想起新时期文学揭幕之初出现的一篇有名的小说,即何士光的《乡场上》。那篇小说里写了一个贫穷、屈辱、在乡场上没人看得上眼的农民冯么爸,居然敢于站出来作证,证明那个权势很大的乡支书的孩子是打了人了。冯么爸从改革开放之初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的历史变革里汲取了力量,表现出了人的尊严的觉醒。那篇小说也因此获得了一种历史的界标的意义。《漂二代》所写的故事,我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这一主题的延续。在另一种历史情势下,由另一些人物演出另一些人生的戏剧场面:不法官商联手用假证据制造冤案以维持他们的威严和脸面,他们甚至能在一段时间里逼迫进了城的,已经温饱无虞了的“冯么爸”的下一代们出来作证,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挡得住在更高的历史阶梯上渐渐觉醒了的社会公正与人的尊严的追求者和守护者的脚步。这是现实生活长河在迂曲地前进的必然结果。

现在可以来谈谈《漂二代》在艺术上的某种矛盾状态了。小说虽然写了几组不同的人物群像,也写了几个较有深度和新意的人物,但给人的总体审美感受,仍然有人物刻画浅尝辄止、笔力过于分散的印象。有众生相的浮雕,缺少立体的殊相的圆雕。这是让人感到不满足的。公正一点地说,小说现有的以一个事件来组织素材、编织情节、显现人物的结构方式,决定了小说难以把笔力集中在塑造人物上。虽然有这样的局限,但是在有些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揭示和性格的刻画上,作者还是贯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的。比如宋肖新这个人物,我看就写得有点深度。他是想把她写成“漂二代”中有尊严、有人格、有追求的青年,而且也写得比较令人信服。小说生动、细腻地写出了她在与冯功铭的恋爱中欲纳还拒、矛盾遽遽的精神状况,写出了她对女友李豫生以青春美色去换取着华安逸的物质享受的“要现实点”的生活态度的反感 and 内心深处的惶惑。特别是后来写到她应汪光军之约到后海音乐厅跟他聊天、跳舞时微妙的心里变化,写汪光军拟请她当光大集团企业形象代理人的甜言蜜语对她的诱惑力。最后才有力地写出她在内心的挣扎和现实的推动下终于获得人生的自信和爱情的幸福,走上坚实而朴素的生活道路的结局。这些尖新锐利的笔触,显示了人的灵魂的复杂性,使这个走着向上的人生之路的年青人形象更加真实可信了。

再比如说那个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的女孩“小东北”,原来抱着哥儿们义气,自告奋勇地替张杰设计勾引汪光大,好让张杰绑架他,报复他以泄恨,但当她与汪光大接触多之后,发现汪光大虽然有富二代的霸气,有不讲理的地方,但也有宽厚、实心眼儿的一面。这样“小东北”对这个男孩反而有好感了,不忍心害他了,最后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保护了他,也阻止规劝了张杰。这个女孩的形象也写得比较真实。

但是其他的人物,有的就写得太正了,比如肖祥,比如李京生,还有那个呵护外来居民的韩冬,他们多少有些成为正确观念的传声筒的味道。而张杰则写得太邪了,他一个劲地要报复、耍闹事的极端言行以及他后来的转变,都缺乏生活的依据和逻辑,给人支绌、弥缝的感觉。中国古人讲到写人物时,提出的美学原则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赞赏“明镜照物,妍媸毕露”,“虚空传响,清浊必闻”。这是很有些艺术辩证法的,可以供作者深思借鉴。

另外,小说以一件小事来辐射全局、组织全篇的写法,也是有得有失的。得的方面是,一石投潭,水波一圈圈漾开,是一个自然的生活过程,便于展开情节、浮现人物、形成完整的结构。失的方面是,这个“假伤门”事件,人为的假定性比较明显,起因有违常理,事情比较简单,而且一开始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悬念,一目了然。一件不难弄清的小冤案,却拖延了整整10天才解决,肖祥在拘留所温习功课,心平气和,清虚无为,等待上头纠错赔偿,而这10天也是张杰在外头拼命要报复,要捅破天大闹一场,酝酿并实行诱绑汪光大的时间。我感到作者似乎在有意延宕事件的进展,推迟最后解决的到来。而事件本身却是比较简单易解的。这样小说的情节设计,就有些不太合情理,有些破绽了。

## 城市化底层的奋斗与尊严

雷 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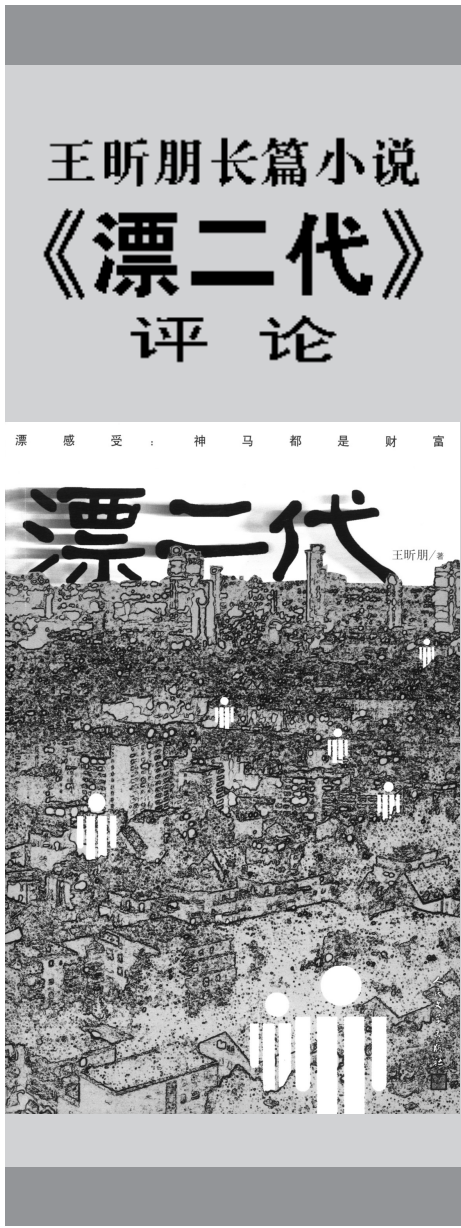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漂二代》可谈的方面自然很多,但在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最主要的成绩在于,它所提供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心理信息的容量之大、之丰富;它是如此的饱满生动,把我们熟悉的某种真实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而它是一部具有较高社会认识价值的作品。有的作品侧重于审美,它则侧重于社会认识价值,亦无不可。读《漂二代》,让我想起马克思谈欧仁·苏《巴黎的秘密》和恩格斯谈巴尔扎克时,都谈到有的作家在客观上有可能提供比同时代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真实和丰富的东西。

以《漂二代》而论,它具体围绕来京打工者——“漂一代”“漂二代”及其户口问题,涉及司法、高考、福利、教育、婚恋、就业、性权利、住宅,直至人的平等和尊严等一系列绝对中国化的城乡二元对立问题。它起于北京地区特有的户口问题又决不限于户口问题。整个作品展开了大量鲜活生动的不同人的当下生活故事,描绘了一大群性格面貌和人生经历、处世态度各异的人物。写出了形形色色底层人物与北京这个突飞猛进的大都会之间的隐秘关联——犹如看到高楼大厦与它的支撑物之间的关系,其结构方式、组织形式、人员构成、运作流程,以至于使我们対大北京的物质、精神、文化的构成有了新的更切近实际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王昕朋以他的底层视角、平民立场,以及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勇敢。

那个“假伤门”冤案不过是小说的头、引线,贯穿始终。这是作者的聪明处,是他聚拢繁多生活的手段,但“假伤门”本身比较简单,而由它展开的东西却丰富复杂得多。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十八里香”这个城市边缘的打工者聚集地。这里有3万多人,人称河南村,有共同的文化习俗甚至亲缘关系,是个特殊的文化群落,甚至可视为一块文化“飞地”。这里已经生活了两代打工者了。这样的村落,在北京真不知有多少。他们为现代大都会——北京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记得路遥有个观点,认为城乡交叉地带,包含的信息最为丰富,最适宜观察中国社会的心态和人心。这是很有道理的。这里的“十八里香”也正是一个不断被“城市化”蚕食的城市交叉地带。从这个村落的流变也可看出浓缩了的近期北京发展史。比如,在这里,调查会开成了“诉苦会”,几乎每个人都遭受过不公正,而不公正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差异和偏见引起的。人们是再也不愿回到乡下了。但融入城市又何其之难。北京户口就困扰着每个人,而困扰人们的又何止户口问题?大工地诗歌节上的一副对联“建高楼楼高千米寸铁寸土全是农民工奠基,筑大厦厦有万间单间总会可有劳动者半间”,就颇能代表他们不平的心情。

对于长篇小说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看它能否写出人物心



## 理想主义情怀

崔艾真

王昕朋的《漂二代》的贡献在于,相对于为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甚至鲜血的第一代农民工,他第一次在文学上提出了“漂二代”这个概念,给了漂二代一个文学形象的定义,使“漂二代”以整体的群像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使社会不能不对这些如次生林般齐刷刷成长起来的农民工的后代视而不见。他们对城市的需求,比他们的父辈更复杂、更高难,就像作品里张刚说的那样形象:“我爸他是来北京挣口饭,我是来北京挣钱!”当然也有一些更形而上的问题。他们的内心比父辈们更敏感细腻,他们情感的表达方式比他们的父辈更接近现代。比如书中所写的张刚、张杰兄弟俩,他们的父亲遇到拖欠工资的情况时,往往采取以跳楼、爬电线杆等办法,而“漂二代”们则诉诸法律,或者借助网络、媒体来推动问题的解决。书中所反映的“假伤门”事件,最后也的确得到了网络“给力”。同时,他们极度渴望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他们渴望在城市体制中谋求一席之地,他们渴望公平和公正的境遇,他们渴望与城市人心灵对等等。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反映。虽然这些渴望的东西距离他们也许很遥远,但在王昕朋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包括像冯功铭这样的城市青年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和努力。

从这部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理想主义的情怀,看到作家对中国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善意的、急切的希冀,看到作家对“漂二代”的美好情感和期许。理想主义不仅是“漂二代”们的需要,也是整个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灵的图景和时代灵魂的状态。我感到,《漂二代》还是深切地揭示了在两种文化冲突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漂二代”们的漂泊感、在路上感、夹缝感、无归属感。宋肖新回乡办护照受到冷遇,谁没有遭遇过?宋肖新与北京某副区长的儿子冯功铭谈恋爱,这一爱情貌似非功利,实际隐藏着诸多的不平等。户口、地域、出身门户、贫与富都不对等。这不是男女主人公自己所能决定的。于是,美丽的宋肖新不断告诫自己,结婚前决不能被破身,这个底线决不能突破。她的身份焦虑和身份诉求,不能认为是无病呻吟。当然,底线还是提前被突破了,她失身了,这一笔是真实的。宋肖祥连续3年当选为打工子弟学校的“三好生”,但这一荣誉并无实际意义,尤其不能解决高考地问题,使得肖祥极为烦躁而且沮丧。从作品中诸多人物命运来看,他们最后都无不遭遇人的尊严问题。宋肖新一再告诉自己,当一个人尊严被夺走时,一条路是委曲求全,一条路是斗个鲜血淋漓、两败俱伤,经验告诉她,应该选择前者,也就是选择委曲求全。这里所包含的辛酸与痛苦耐人寻味。

《漂二代》虽为小说,却是纪实文学写法,那就是对事件的依赖过重,基本按原型和生活方式来结构。一个案件,一个村落,两代人,平面铺开式。是一种事理结构而非情理结构。作为表相很真实,尤其“假伤门”事件的营构,颇具匠心、一石三鸟。它是贫富矛盾、城乡矛盾、贪腐矛盾的纠结。汪光军的行为动机欲望不止来自他恶劣的天性,也来自于历史潮流的漂浮。

但是,需要提出,作者究竟是写过程,还是写心灵;是写事件,还是写命运;是写表象,还是写内在的主观的真实;是写群像,还是写一两个中心人物,并通过他们曲折的命运和内心,写出一个时代的侧影?事情也许不是这样的对立,但倚重点的模糊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宋肖新与冯功铭,一个是不失正直的官二代,一个是贫寒的打工女子,他们的恋爱,本应挖掘出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及人性复杂性的内容,却失之平面化了。从揭示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普遍性看,似乎写群体更有力;但从文学的长远辐射力来看,还是要以少胜多,以一当十。这涉及到现代小说的时间与空间的处理。

作者王昕朋在谈到《漂二代》的创作时说:“我所关注的底层生活,以及我所持有的平民立场,与其说是在聚焦、关注甚至试图提出问题并最终施以解决,不如理解为我对自身精神焦虑的缓解,是我在生存的心理意识和平民感情的情緒摆脱不掉时,挥笔而就的价值投向和精神牵引。这种他者与自我的相互辩证乃至彼此驳难,也成为我小说叙事的底层立场和平民意识的重要面向。”这段话强调了作者的写作是对自身精神焦虑的缓解,问题是,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光为了缓解还不够,它必然是作者与他者,个人与社会,相互激荡并进入某种境界的产物。

对人的关心、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是文学的责任,也是作家的使命,凡是能够引起较大社会关注的作品,大都倾注了作家的人文关怀,体现了为普通人立传画心的使命意识,王昕朋向来勤奋笔耕,是个地地道道的闲不住的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持续地关注社会生活、关注人的精神成长,他搞调研、做访问,大量接触普通百姓,把自己所见所闻消化成思考、形成文字、塑造为具体的艺术形象,因此就有了不断推出的一部部作品。《漂二代》只是他辛勤收获的其中一部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农民工问题或说进城务工群体问题又出现了新的现象,就是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第二代”已长大成人,他们无城市户口、无稳定职业,甚至无稳定身份,像是漂浮于大都市的一代人,因此作为作家的王昕朋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人的生存现状,他把他们称为“漂二代”,其实王昕朋对这些人的定位远远超出了这些人,演艺圈、文化圈,甚至IT界无户口、无稳定职业地浮在大都市的人也是他眼中的“漂二代”,他以自己的最新问题长篇小说《漂二代》对这一问题、对这一群体进行了艺术的探讨。作品通过对农民工二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挣扎、奋斗、迷茫的多色调描述,笔触犀利地反映了他们在沉沦和奋进中的多重困扰和挑战,异常真切地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感情、欲望和追求,为我们当今时代的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借鉴。

王昕朋信奉忠于现实、反映现实的理念,丝毫不愿意夸大和歪曲生活,他的作品情节设置得像生活流一样真实、自然,没有丝毫的造作之感,具体地说,长篇小说《漂二代》以一个“假伤门”事件为核心,讲述了农民工子弟肖祥、张杰与富商汪光军的儿子汪天大在酒店发生冲突引发的故事。本来事件已经和解,但汪光军觉得丢面子,找关系为儿子重新做了脑震荡医学鉴定以致肖祥遭到刑事拘留。这件事在农民工聚集地北京十八里香引起强烈反响,种种社会矛盾因之更加突出,由此也牵动了各方面的力量,牵出了一个难以掩饰的矛盾。实际上,王昕朋写出这样的故事,首先是因为他对“漂二代”有着细致的观察,对一大批底层生存者有深入人的思考,他不想简单地为一个群体贴个标签,而是想要通过自己塑造的人物,引起大家的关注。他提醒我们,大家虽然生活在一个正在迅速腾飞的社会,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体验各种社会境况的条件,我们不能因此而回避弱势群体的存在,更不应忽略他们的精神世界与精神诉求。

王昕朋作品的思想深度来自他长期的积累。作为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作家,他经历过乡村、城市不同生活,从基层到中央的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等不同岗位,他的工作经历也非常丰富,但不管他工作在什么样的岗位上,他总能保持生活的热情,保持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同时,永远不忘他对文学的热爱与梦想。王昕朋从1976年便开始发表作品,笔耕不辍,先后出版长篇小说《红月亮》《天下苍生》《合著》《天理难容》《团委书记记》,中篇小说集《是非人生》《姑娘那个十八岁》,散文集《冰雪之旅》《我们新三届》《金色莱茵》《宁夏景聚》;长篇报告文学集《雄壮地崛起》《雄性的太阳》以及政论式作品集《他们播种希望》《历史前进的足迹》,在社会上引起积极反响。他早在1993年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在他的创作中,对普通人的关注、对各阶层人的心灵的关注,始终是他不懈追求。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漂二代》是王昕朋的最新作品,是他从生活中萃取的最新果实。2009年中国作协组织作家定向深入生活,他不顾工作繁忙,报名深入到北京某区,来到农民工聚集的地区,用真心真情去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作品凝结了他对当代生活的最新概括。他的这部最新作品以生活于北京的“漂二代”为主角,细致入微地写了农民工子女在当下的城市生活中的多重困扰和挑战,展现了“漂二代”的生存状态和悲欢离合,实际上通过这些描写,反映了当下众多社会现实内容与汪光军的历史、文化反思,充分彰显了现实主义的力量,表现出作家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在现实矛盾突出时期应该具有的文学与思想担当。

我们还应该看到,作品不仅写出了外来人口面临的社会问题、户籍问题,而且写出了这些特殊人群的无归属感、身份焦虑感、漂泊感,以及面对大量具体问题时尊严问题,直击了当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隐患。作品笔下的人物鲜活,语言质朴、泼辣,堪称一份最新的小人物大都市生存报告。如同作者其他一些作品一样,《漂二代》有力地揭露了生活的弊端和人生的扭曲,在写作过程中,作家所着意侧重描写的是各色人物各自的个性乃至主体性,他想写出他们身上的温情与爱意、仇恨与苦痛、困惑与迷惘。但令人欣喜的是,他的描写并没有走向惯常的灰暗或消极,并没有导致作品基调的压抑,他写出了普通人、小人物的困惑、压抑感,但也表现了他们积极向上追求,从而反映了作家既正视历史的阵痛,又憧憬未来的光明,既正视生活的暗流,又讴歌时代的亮色的特征,这样的创作,源于作家对现实的深刻认识,这使他能够直击丑恶与病象,同时使作品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彩,让人们得到启迪、获得鼓舞。

关注普通人在夹缝中生存的痛楚是作家的责任

梁鸿鹰